

譎諫與垂訓—羅隱《讒書》探析

李建崑*

【提要】

晚唐文學家羅隱，能詩能文，其《讒書》五卷，尤其受到後人的注目。《讒書》原為行卷工具，結果卻超越求仕功能，成為批判政治社會的作品。這五十八篇小品仍延續儒家「委婉譎諫」的傳統，仍有「借史垂訓」的意圖。羅隱遙承白居易「為君、為民、為時而作，不為文而作」的寫實精神，以《讒書》回應晚唐政治與社會種種亂象，代表「青年羅隱」對晚唐政治情態與社會現實的「嚴正關懷」。書中使用高明的寫作技巧，提升諷刺力道；包括近二十種文體，堪稱古典文體的集中操練與展示。其寓言作品，數量雖不多，卻創意十足。凡此，都使《讒書》一書，成為唐代諷刺文學不可多得的傑作。

關鍵詞：羅隱 讒書 羅昭諫集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序言

晚唐文學家羅隱（833-909），能詩能文。其《讒書》五卷，自謂：「有可以讒者則讒之」，目的在「警當世而誡將來」，顯然有所為而為。其文體多樣、主題深刻、創作動機、表現手法各方面，都有特色。絕非單純洩憤之作，在晚唐諷刺小品中，堪稱傑出。

學界更從當代視角，推崇《讒書》為晚唐「諷刺小品」之傑作。民國26

年（1937）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汪德振《羅隱年譜》，為當代羅隱研究，奠立極佳基礎。1983年12月華文雍校輯《羅隱集》正式出版，這是一部點校本，列入北京中華書局「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中。其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也在1995年6月出版潘慧惠《羅隱集校注》，這些書都是學界研究羅隱相當倚重之著作

本文擬在現有的研究成果上，對《讒書》之成書、《讒書》之內容要旨及藝術特性深入論析，期望對羅隱文學成就作出正確的評價，並對晚唐諷刺文學研究，有所裨補。

二、《讒書》之外圍考察

羅隱一生著述甚為豐碩，流傳於今者，有《甲乙集》、《讒書》、《兩同書》及後人所彙編之《羅昭諫集》。歷代史書、目錄專著如《吳越備史》、《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都有載錄。

在羅隱所有作品中，尤以《讒書》最為突出；此書曾單獨流傳，並深受歷

代讀者注目。《讒書》一書，陳振孫已經說：「求之未獲」，可見在南宋已屬

難得，歷元明清，沈埋甚久。清嘉慶丙寅（1806）黃丕烈獲得一不全的傳鈔本。

再經多人鈔補成為完本。吳騫（字槎客）又於嘉慶丁卯（1807）刻入《拜經樓叢書》，從此有了單行刊本。原鈔本原缺四文，經吳翌鳳（字枚庵）、徐松（字

星伯）等人根據類書鈔補，目前流傳的《讒書》是五卷本，卷二仍缺〈蘇季子〉、

筆者所引《讒書》資料，主要根據潘慧惠，《羅隱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潘著收錄《甲乙集》十一卷、《讒書》五卷、《兩同書》十篇、《廣陵妖物志》、《雜著》，並有《附錄》六種，資料十分豐富。

· 譎諫與垂訓—羅隱《讒書》探析 ·

· 25 ·

〈忠孝廉潔〉兩篇。

論及《讒書》性質與寫作動機時，不能不詳讀《讒書》所收錄的兩篇序言。

羅隱在《讒書·序》中說：

《讒書》者何？江東羅生所著之書也。生少時自道有言語，及來京師七年，寒饑相接，殆不似尋常人。丁亥年春正月，取其所為書詆之曰：「他人用是以為榮，而予用是以為辱。他人用是以富貴，而予用是以困窮。苟如是，予之舊乃自讒耳。」目曰《讒書》。卷軸無多少，編次無前後，有可以讒者則讒之，亦多言之一派也。而今而後，有謂予以嗶自矜者，則對曰：「不能學揚子雲寂寞以誑人。」

羅隱自述此書並非逞弄才辯而作，而是旅居京師七年，面對種種黑暗與醜惡，無法沈默以對；勇敢揭露與批判，雖然衣食無著、寒餓相接，卻仍兀傲不屈，自題此書為《讒書》。

此序還透露《讒書》是羅隱親自編次舊著而成，初次成書於「丁亥年」。按丁亥年相當於唐懿宗咸通八年（西元867年），據汪德振《羅隱年譜》所考，羅隱時年三十五，所以《讒書》是一部青年時期的選集，而且是作為「行卷」之用。以文為贄、投謁公卿，本為唐代社會常見現象。羅隱汲汲於遇合，投謁、行卷的結果，卻仍然承受屈辱與困窮，當為羅隱始料未及。《莊子·漁父篇》云：「好言人之惡，謂之讒。」羅隱以「讒」為書名，當然寓含激憤之情與深沈用意。

再從書末所附〈重序〉來看，《讒書》也有迥異時流的寫作目的。羅隱在〈重序〉中如是說：

隱次《讒書》之明年，以所試不如人，有司用公道落去。其夏，調膳於江東，不隨歲貢。又一年，朝廷以彭口就辟，刀機猶濕，詔吾輩不宜求試。然文章之興，不為舉場也明矣。蓋君子有其位，則執大柄以定是非。無其位，則著私書而疏善惡。斯所以警當世而誠將來也。自揚、孟以下，何嘗以名為？而又念文皇帝致理之初，法制悠久，必不以蟣虱癢痛，遂偃斯文。今年諫官有

詳情參閱萬曼，〈羅昭諫集〉敘錄，收在萬氏所著《唐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臺北：明文書局，1982年臺灣版）頁344至350。

潘慧惠校注，《羅隱集校注》頁39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6）。

· 東海中文學報 ·

· 26 ·

言，果動天聽。所以不廢《讒書》也，不亦宜乎？

〈重序〉揭示了羅隱秉持的文章寫作觀：「不為舉場」而作；而是為「疏善惡」、「警當世」、「誠將來」而作。〈重序〉還透露羅隱曾於唐懿宗咸通九年（西元868年）應試落第，歸返江東。隔一年，即唐懿宗咸通十年（西元869年），龐勛死於亂軍，朝廷詔罷科舉。此即〈重序〉所說：「朝廷以彭口就辟，刀機猶濕，詔吾輩不宜求試。」直到咸通十一年（西元870年），羅隱才有再次應舉之機會。

汪德振《羅隱年譜》將〈重序〉之寫作年代定在唐懿宗咸通十年（西元869年），羅隱三十七歲。然而，汪德振又引述越縵先生《荀學齋日記·光緒癸未三月二十四日》：「〈請追癸巳日詔疏〉、〈與招討宋將軍書〉二文，蓋

私擬為之」。大陸學者程顯平曾就汪德振《羅隱年譜》與宋威將軍事蹟，發現問題，並提出質疑，認為：〈與招討宋將軍書〉一文，作於乾符三年（876年）之後，因此《讒書》在成為目前這個情況，有三種可能：

1、重新刻板在876年後，作者本人對原書有補充。據第五卷與前四卷內容不同來看，很可能是後補入的。2、原書為前四卷，流傳過程中有人將第五卷加入。因宋時此書已不見，故這種可能性也很大。3、原有五卷，只有汪先生所說的二文在流傳過程中被人加入「私擬為之」。據《四庫全書總目》載：「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求之未獲，蓋佚已久矣」。故第三種可能性也是有的。

程顯平這篇短文所提說法，固然值得參考；《讒書》之流傳過程，的確有這種可能，然而並無礙於它的價值；《讒書》最值得後人注目的還是擁有與唐代士子不全然相同之寫作精神。

程千帆先生在〈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一文，特別提醒吾人注意羅隱：「他是用怎樣的一種作品去行卷」以及「…由於用《讒書》這樣的作品去行卷，已經招致了『辱』和『困窮』的後果，可是這位作家仍然堅持『有可以讒者，則潘慧惠校注，《羅隱集校注》頁499，（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6）。

汪德振，《羅隱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民國26年（1937））頁29。

汪譜，頁29。

現行流傳之《讒書》共五卷，附前〈序〉、〈重序〉，篇題六十，闕文兩篇，尚存五十八篇。

此為程顯平，〈讀羅隱《讒書》劄記〉一文之結論。詳見（《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2期（第30卷第2期））。

· 譎諫與垂訓—羅隱《讒書》探析 ·

· 27 ·

讒之』的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程千帆先生進一步說：

羅隱十年不第，正是他以《讒書》這種使當時統治階級，特別是當權者感到頭痛的文章行卷所造成的。在他已活到七十六歲高齡的時候，另一位詩人羅袞曾寫詩送他說：「平日時風好涕流，《讒書》雖盛一名休。」是一語破的地說出了事情的真相。

易言之，羅隱編次《讒書》之初，或許打算作為「行卷」工具，藉以獵取功名；然而身處世亂，本於良知，不能不言，於是一部「行卷之作」反成為不討喜的「諤諤之言」。羅隱《讒書》與皮日休《皮子文藪》、陸龜蒙《笠澤叢書》三本書，如就性質上看，均為「行卷」之作，卻都有關懷天下之襟期與報負，此所以魯迅譽為「一場糊塗的泥塘裡的光彩和鋒鋸」。

程千帆先生認為這些書，至少還證明一個事實，即：「在唐代某些作家的

手中，行卷不只是獵取功名富貴的敲門磚，同時也是一種公然宣傳自己的進步思想、發抒自己健康感情的手段，同時也就是向反動勢力、黑暗社會進行合法鬥爭的武器。」當然，這樣的作品，雖然維持住作者人格精神獨立，卻也深重

地影響仕途發展。

惠聯芳在〈夾縫中的生存—羅隱生存狀態分析〉一文也認為：「在羅隱身上存在著這樣一種背謬現象」。她說：

在羅隱身上存在著這樣一種背謬現象：一方面他想通過科舉考試躋入政治權力的中心，從而拯大道于既衰，實現理想王國，即實現君主賢明，人民安居樂業；另一方面他想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堅持自己的價值取向。但是前者實現的途徑則是以降低後者的力度而達到的。二者之間難以調和。于是形成一定的張力，羅隱在困難的抉擇中痛苦地煎熬著。有時偏向前者，有時偏向後者。

該文將羅隱之生存狀態，分成「入目前的生存狀態與價值評判」、「入幕後的參見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載《程千帆選集》（上下冊）（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1版1刷）。

按羅袞，〈贈羅隱〉詩全文：「平日時風好涕流，讒書雖盛一名休。寰區歎屈瞻問天，夷貊聞詩過海求。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伴赤松遊。何當世祖從人望，早以公臺命卓侯。（隱開平中召敗夕郎，不就。）」載《全唐詩》卷734，北京中華書版，頁8386。

見魯迅，〈小品文的危機〉，載《南腔北調集》。

惠聯芳，〈夾縫中的生存—羅隱生存狀態分析〉（《河西學院學報》，第20卷第6期，2004年）頁46。

· 東海中文學報 ·

· 28 ·

生存狀態與價值評判」。其結論為：

羅隱前期希望以科舉來實現自己的願望，扭轉乾坤。他個性張揚，雖有才能，但家境貧寒，無所依傍，他又不願向權貴搖尾乞憐，科舉的成功化為烏有。其付出的努力付諸東流。後期他入錢鏐幕府，張揚的個性有所內斂，表現方式變得柔和一些，但他的讓步並未取得成效，他依舊未找到個性與社會的契合點。他只能不斷哀歎時光飛逝，功業未建，厚恩未報。在這種沈重的精神負擔下，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這一段文字對於吾人了解羅隱的生存情境極有助益。羅隱從唐宣宗大中六年（西元852年），二十歲之年首度舉進士不第，至咸通十年，羅隱已七度應試不第。其〈湘南應用集序〉云：「隱自大中末，即在貢籍中，命薄地卑，自己卯至於庚寅，一十二年，看人變化。」羅隱自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己卯（859年）至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庚寅（870年）十二年間，除了短暫歸返故里，一直困居長安。從羅隱三十歲所作之〈投所思〉：「憔悴長安何所為，旅魂窮命自相疑。滿川碧嶂無歸日，一榻紅塵有淚時。雕琢只應勞郢匠，膏肓終恐誤秦醫。浮生七十今三十，從此淒惶未可知！」不難看出羅隱「看人變化」之存在境遇。處身在這種狀態下，仍能秉其如椽之筆，臧否政局、諷諭時事，真如清吳穎在〈重刻羅昭諫《江東集》敘〉所說：「其高節奇氣，有可以撼山嶽而砥江河者。」在晚唐士人普遍陷入生存困境之際，羅隱仍維持不凡的「精神高度」，的確令人心生景仰，讚嘆不已。

三、《讒書》之文體特徵

今傳《讒書》是五卷本，篇題六十，闕文兩篇，共計五十八篇。篇題分別爲：〈序〉、1〈風雨對〉、2〈蒙叟遺意〉、3〈三帝所長〉、4〈秋蟲賦〉、5〈解武丁夢〉、6〈救夏商二帝〉、7〈題神羊圖〉、8〈伊尹有言〉、9〈後雪賦〉、10〈敘二狂〉、11〈吳宮遺事〉、12〈本農〉、13〈丹商非不肖〉、惠聯芳，〈夾縫中的生存—羅隱生存狀態分析〉，頁47。

潘慧惠校注，《羅隱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6），頁555。

同上注，頁10。

轉引自潘慧惠校注，《羅隱集校注》，頁646 至647。

· 譎諫與垂訓—羅隱《讒書》探析 ·

· 29 ·

14〈英雄之言〉、15〈聖人理亂〉、16〈莊周氏弟子〉、17〈雜說〉、18〈龍之靈〉、19〈子高之讓〉、20〈說天雞〉、21〈蘇季子〉闕文22〈惟嶽降神解〉、23〈忠孝廉潔〉闕文24〈疑鳳臺〉、25〈屏賦〉、26〈秦始皇意〉、27〈婦人之仁〉、28〈道不在人〉、29〈市儼〉、30〈君子之位〉、31〈荆巫〉、32〈蟋蟀詩〉、33〈三閭大夫意〉、34〈畏名〉、35〈三叔碑〉、36〈天機〉、37〈辨書〉、38〈齊叟〉、39〈槎客喻〉、40〈漢武山呼〉、41〈木偶人〉、42〈市賦〉、43〈越婦言〉、44〈悲二羽〉、45〈善惡須人〉、46〈秦之鹿〉、47〈梅先生碑〉、48〈二工人語〉、49〈書馬嵬驛〉、50〈投知書〉、51〈與招討宋將軍書〉、52〈迷樓賦〉、53〈說石烈士〉、54〈答賀蘭友書〉、55〈拾甲子年事〉、56〈序陸生東遊〉、57〈清追癸巳日詔疏〉、58〈刻嚴陵釣臺〉、59〈弔崔縣令〉、60〈代韋徵君遜官疏〉、〈重序〉。

文章篇幅超過四百字者，僅〈與招討宋將軍書〉、〈說石烈士〉、〈答賀蘭友書〉、〈拾甲子年事〉、〈序陸生東遊〉、〈清追癸巳日詔疏〉、〈代韋徵君遜官疏〉七篇，其餘絕大多數都是兩百字上下之小品。〈蒙叟遺意〉、〈秋蟲賦〉、〈龍之靈〉、〈畏名〉，四篇，甚至以不足百字之篇幅成文；尤其〈秋蟲賦〉，文長僅六十九字，卻能做到：意旨深刻、形象鮮明，的確不易。

羅隱在這五十八篇小品中，使用：序、對、賦、論、辨、書、說、解、題辭、疏、銘、弔、敘、碑、傳等近二十種文體，還有寓言、軼事小說，甚至收錄一首四言詩。如果《讒書》僅僅作為「行卷」工具，的確展現羅隱之史才、詩筆、議論，以及驅遣文體之能力；如果《讒書》作為「傳達思想」、「諷諭時世」之載體，不能不說也是極爲高明的設計。理由是全書意旨新穎，短小易讀，技巧優越，諷刺性高，讀者覽之，即能意會。

根據郭英德〈論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的生成方式〉所析，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的形成方式不外三途：一是作為「行爲方式」的文體分類；二是作為「文本方式」的文體分類；三是「文章體系」內的文體分類。至於劃分文體的方法，又不外以「文章的內容和功用」、「文章所採的表現方法」、「文章的結構特

徵」、「文章的語言風格」為標準。如果從上述角度出發，羅隱《讒書》在文體運用上，其實是很有創意的。

見郭英德，〈論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的生成方式〉，文載於《學術研究》2005年第1期。

詳見李豐楙，〈文體分類研究〉，文載於《青島師專學報》，第11卷第2期，1994年6月。

· 東海中文學報 ·

· 30 ·

《讒書》中以「史論」之數量最多，也最有特色。如：〈三帝所長〉、〈解武丁夢〉、〈吳宮遺事〉、〈丹商非不肖〉、〈英雄之言〉、〈聖人理亂〉、〈莊周氏弟子〉、〈子高之讓〉、〈疑鳳臺〉、〈漢武山呼〉、〈木偶人〉、〈善惡須人〉、〈秦之鹿〉、〈書馬嵬驛〉等文，針對堯舜禹、武丁、伍員、太宰嚭、劉邦、項羽、周公、孔子、莊紫、無將、伯成子高、尹吉甫、張良、陳平、比干、費無極、楊貴妃等特定歷史人物提出評論。此外，〈三叔碑〉、〈梅先生碑〉雖是「碑體」；〈救夏商二帝〉、〈伊尹有言〉、〈婦人之仁〉雖是「說體」；〈越婦言〉接近「軼事小說」，都牽涉到確定歷史人物，也接近「史論」性質。

其次，羅隱在〈蒙叟遺意〉、〈三閭大夫意〉、〈秦始皇意〉、以及〈解武丁夢〉、〈惟嶽降神解〉等篇，刻意使用「○○意」、「解○○」、「○○解」之命題方式，似有建構文體之傾向。〈本農〉一文，用「本○○」之命題方式，似可視為韓愈「原○○」之遺形。羅隱〈雜說〉，則與韓愈〈雜說〉同題；羅隱〈龍之靈〉甚至與韓愈〈雜說〉之取喻相似，都是以龍為喻；吾人雖無更多文獻可資證驗羅隱學韓愈，卻很難不產生這種聯想。

再次，羅隱運用某些文體，常逾越該體之原始規範。例如其〈風雨對〉，既不同於「應詔陳政」之「對策」；也不同於文人「假設」之「問對」，也不是宣說一段天地、鬼神之論，而是借風霜雨雪本為天地所掌握，如今為鬼神所藏伏、所擁有，影射君權旁落、重臣、強藩用事。因此，〈風雨對〉雖有「對策」、「問對」之遺形，性質已非傳統之「對體」。再如《讒書》中的幾篇賦體：〈秋蟲賦〉、〈後雪賦〉、〈屏賦〉、〈迷樓賦〉，全為諷刺小賦；又其〈說石烈士〉以「說」代「傳」；〈梅先生碑〉以「碑誌」替代「史論」，凡此都可看到羅隱《讒書》一書，在文體運用上極有特色。

四、《讒書》之題材類型

羅隱在〈重序〉說得很明白，《讒書》之寫作目的是：「疏善惡」、「警當世」、「誠將來」；是從儒家、入世之思想態度出發。《讒書》五十八篇的立言取向，一方面揭示晚唐朝野種種亂象；另一方面辨析觀念，導正世風；當然在面對仕途挫折時，也不免借此舒洩憂憤。總體看來，《讒書》仍以指向政

· 譎諫與垂訓—羅隱《讒書》探析 ·

· 31 ·

治、社會之題材，數量最多；而抒發個人情感及純理思辨之題材，則比重較小。

筆者針對各篇性質、題旨，總體觀察，大致從政治、社會、情感三個取向將《讒書》之題材分為三大類型，舉述適當文例說明之。

（一）譏議時政

晚唐是個昏君在位、朝臣無能、宦官專權、藩鎮為禍的時期。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卷二四四評曰：「于斯之時，閹寺專權，脅君于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斂日急，骨血縱橫于原野，杼軸空竭于里閭。」羅隱處身在這樣的環境

中，自不能默爾而息，因此，《讒書》有三十餘篇是譏議時政之作。

羅隱首先關切帝王施政的態度。相傳伯成子高在禹即位後，辭去諸侯，躬耕於田野。禹屈就下風以問，子高則借機告誡禹，期待禹要收斂野心，謹慎去取；禹因此有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之政。羅隱在〈子高之讓〉這一篇文章中，對「伯成子高責禹」這一段史事，提出全新解讀，借此諷諭帝王施政時，應謹慎去取。

相同的題材，也見諸〈丹商非不肖〉一文。羅隱認為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非「不肖者」；堯、舜之所以用「不肖」之名廢其子，目的在：「推大器於公共」。於是羅隱既揭發晚唐帝王任用親信、爭權奪利；也諷刺晚唐帝王未能「示後代以公共」。

在〈龍之靈〉一文，甚至諷刺帝王，若不知體恤人民，將危及自身。文中以龍為喻，認為龍需水始能發揮神力，暗喻帝王若離棄人民，將難有所成。文中之龍，如不取水，則無以為神；取水過多，則又傷及魚鱉。因此，此龍「可取」之處不多。

其次，羅隱憂心佞臣與強藩干政，主張維護君權，抑制宦官、權臣、藩鎮之擅奪。

羅隱在〈風雨對〉中，即對此有巧妙的辯證。依照常理，風霜雨雪，本為天地所掌握；山川藪澤，則為鬼神所藏伏。如今風雨不時，歲有饑饉；霜雪不時，人有疾病，於是禱於山川藪澤。本為天地所掌握之風霜雨雪，因此落入鬼神所有。羅隱顯然不是在講一段天地、鬼神之論，而是影射君權旁落，重臣、

· 東海中文學報 ·

· 32 ·

強藩用事之政治現實。

第三，羅隱關切晚唐官場生態之惡化，不少篇章涉及此一題材。

羅隱在〈題神羊圖〉中，從「神羊」生發議論，諷刺朝中根本已經沒有正人君子。所謂「神羊」，即傳說中之「獬豸獸」，相傳此獸可「觸奸邪」。而今「淳樸銷壤」，神羊失落本性，又有「貪狼性」，所以不能觸奸；而人們也有「割割心」，神羊即便有意「觸奸」，也不敢輕易「舉其角」。羅隱顯然在譏刺權臣各懷私心，導致正邪不分。

〈後雪賦〉更對那些喜好攀附、諂媚之朝臣，極盡諷刺之能事。從表相看，此文寫司馬相如、鄒陽等人在梁王府詠雪事，內容延續謝惠連之〈雪賦〉。然而羅隱卻借鄒陽之口指摘飛雪：「不擇地而下，然後浼潔白之性」，則顯然是借飛雪生起議論，諷刺朝臣不知擇善、濫於攀附。

相同的題旨也見諸〈吳宮遺事〉，此文描述夫差殺伍員、重用太宰嚭，導致吳國滅亡。文中所述君臣對話，意在突顯伍員肯對夫差講的是真話，而太宰嚭則以欺君、文過為能；夫差識人不明，不聽諍諫，反而賜死伍員，重用太宰嚭。這一段內容，當為羅隱推衍史料而來，目的在提醒當代君王應審慎任用官員，對於那些諂媚君上的臣子，尤應提防，否則必將導致滅亡。

羅隱甚至還在〈代韋徵君遜官疏〉一文，代替受詔次日即已過世之韋徵君撰寫「遜官書」，譏刺晚唐「徵辟制度」之虛偽。全文謝恩之處不忘提醒「遜臣無才無德」，愧對朝中「循陞歷級、不調久次」之官員，有損朝廷美意。其實正言若反，諷刺之意見於言外。

第四，羅隱對於晚唐政局之混亂，相當憂心。羅隱在〈市賦〉中，巧用煩亂紛雜、爾虞我詐之市集，映照晚唐黑暗腐朽、矛盾之政局。告誡執政者，應該謹慎從政。在〈惟嶽降神解〉一文，羅隱甚至暗示唐之國祚，已瀕臨衰亡。

「惟嶽降神」本為尹吉甫〈嵩高〉之詞句，孔子並未視之為語怪之作，也未加刪爿。羅隱認為：「當申、甫時，天下雖理，詩人知周道已亡，故婉其旨以垂文。仲尼不刪者，欲以顯詩人之旨。」也就是說：孔子早就領會尹吉甫之詩意，見到周室衰亡之趨勢，所以未視為「語怪之作」。羅隱顯然想以古鑒今，提醒唐王朝，國運已衰，危機重重。此外，在〈迷樓賦〉中，借隋煬帝為例，認為帝王惑於左右粉黛以及鄭衛之音，聽任將相濫權，是「迷於人」，而非「迷於樓」。在〈書馬嵬驛〉中指責唐玄宗寵幸失當，導致貴妃死於馬嵬驛。同時指

· 33 ·

出堯、湯、玄宗固然遭逢水旱兵革之災，並未滅亡。今之帝王如持續寵幸失當，面對天災、人禍束手無策，則很難免於滅亡。

至於在〈清迨癸巳日詔疏〉這一篇奏疏，雖然可能是羅隱「自擬」之作，口氣卻越來越重，甚至率直反對朝廷詔令京兆尹祈雨事。在這一篇文章，羅隱以商湯、及唐代開國以來十六帝王為對比，明白指斥統治者之愚昧與無能。雖然是就事議論，十足展現羅隱之道德勇氣、社會責任感與清醒的政治頭腦。

（二）臧否世風

政治黑暗及官場腐敗，固然使羅隱深惡痛絕；晚唐社會的混亂、風俗的衰敗、價值的顛倒，同樣令人難以容忍。羅隱大力辨正社會價值觀、針砭「五常」之失落、揭露君王弄虛造假、抨擊市井無賴以儺祭詐財、批判巫師充滿利己之心、譏嘲社會輿論的犬儒風氣，其關懷的層面，十分廣闊。

首先，對社會上錯誤的價值觀，提出批判。

羅隱在〈本農〉中提及：

豐年之民，不知甘雨柔風之力，不知生育長養之仁，而曰我耕作以時，倉廩以實。旱歲之民，則野枯苗縮，然後決川以灌之。是一川之仁，深於四時也明矣。所以鄭國哭子產三月，而魯人不敬仲尼。

子產與孔子，何以受到各自國人截然不同之待遇？關鍵在於：人民不能認同恆久之價值。子產執政，政績斐然，使鄭國暫時屹立晉楚之間，所以子產死後，鄭人哭之如喪親戚。而孔子周遊列國，高倡仁德，雖在謀求天下永久之利益，卻不見時效，得不到魯人之敬意。羅隱以農民感激旱歲的「一川之仁」，而不知豐年的「四時之恩」為喻，深刻批評人們但求一時利益，不能認同恆久價值。其次，羅隱關切世風澆薄、社會混亂之成因。

羅隱在〈莊周氏弟子〉一文，借用莊子寓言，探索當時世風澆薄、社會混亂的主因，述及莊子弟子無將從其學而廢「五常之德，絕人倫之法」，而無將之族原為儒者，不願服膺莊周之教，都離棄無將而歸返魯國。羅隱借莊子之口，對「五常」重新界說謂：「視物如傷者謂之仁，極時而行者謂之義，尊上愛下者謂之禮，識機知變者謂之智，風雨不渝者謂之信。」簡潔覈要，可知羅隱之潘慧惠校注，《羅隱集校注》卷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6），頁407。

· 東海中文學報 ·

· 34 ·

基本思想立場還是儒家，同時也暗示：晚唐社會混亂、風俗澆薄，肇因於朝野廢棄「五常」之德。

第三，大力揭發社會不良風氣。

例如在〈疑鳳臺〉中，羅隱揭露社會上弄虛造假之風，常來自上層統治者。

他舉秦穆公築「鳳臺」為例說：

神仙不可以伎致，鳳鳥不可以意求。伎可致也，則黃帝不當有崆峒之學；意可求也，則仲尼不當有不至之歎。

羅隱認為不能透過音樂技藝而成為神仙，鳳鳥也不會隨人們主觀意志而出現。他對秦穆公築「鳳臺」一事，提出另類解讀，暗示：秦穆公築臺意在掩蓋其女弄玉與蕭史私奔之事，於是「遂強鳳以神，強臺以名，然後絕其顧念之心。」十足諷刺居上位者故弄玄虛之伎倆。

羅隱對市井無賴之徒，假借「儺祭」詐財，也很痛心。在〈市儺〉一文有所針砭。按：「儺祭」本為民間驅魔趕鬼之祭典，本有莊嚴及神聖之意義。然而市井無賴，卻借此變裝斂財，此即文題「市儺」之意。羅隱直書其事，抨擊此種醜惡風氣。在〈荆巫〉一文，同樣對淫祀風氣之下致富的巫師，極為不滿。他認為巫師因祀致富，其靈驗亦必減退；借此說明執政者如牽於「利己之心」，必不能真為天下人服務。末句「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於是者乎？」更進一步指出一個巫師尚且如此，則地位更高的人，對社會之危害也就更為嚴重。

至於〈齊叟〉，則是書寫一段製造對立之故事。述及鄰家老嫗挑撥齊叟與農戶關係，造成彼此矛盾，最後遭到驅逐。羅隱指出：農戶與齊叟不合，關鍵不在齊叟之子，而在老嫗搬弄是非、挑撥離間。羅隱通過這個故事，譏刺欺瞞、

挑撥、製造矛盾的人，對正常社會帶來極大之危害。

第四，除了上述這些社會弊端，羅隱還對朝野知識份子畏崽、犬儒之風氣，作了尖銳譏諷。

羅隱在〈畏名〉中說了一個小故事：

瞭者與瞽者語於暗，其辟是非，正興替，雖君臣父子之間，未嘗以牆壁為慮。一童子進燭，則瞽者猶舊，而瞭者噤不得呻。豈其人心有異同，蓋牽乎視瞻

潘慧惠校注，《羅隱集校注》卷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6），頁421。

· 譏諷與垂訓—羅隱《讒書》探析 ·

· 35 ·

故也。是以退幽谷則思行道，入朝市則未有不畏人。吁！

羅隱以瞭者（明眼人）瞽者（盲眼人）在暗處（位卑）與明處顯（居高位）顯出不同的言論態度，諷刺人們一旦擁有地位，便謹小慎微、畏首畏尾，再也不敢鼓起道德勇氣放言高論。此文篇幅超短，文僅七十九字，言簡意賅，諷刺之意，萬分深刻。

此外，羅隱在〈悲二羽〉中感嘆鸞、雉羽色雖美，一為舞鏡而絕，一因照水而溺，兩者的命運，都十分可悲，均不足取。這是借鳥為喻，抨擊爭強好勝、負才自戕者。在〈二工人語〉中，有感於人們對土木偶與土偶之不同態度，羅隱暗諷當時「重表面、不重實質」的風氣。

至於〈木偶人〉一文，則同樣針對崇華不崇實之風氣，提出針砭。「雕木為（戲）偶」，因其外相華麗，眾人樂而為之；而「絕粒修身」，需鄙棄功名，兼之定力，難為常人所喜。羅隱通過後人對「陳平木偶」與「張良絕粒」的不同態度，說明剗（雕刻木偶）之事，移人情志，從而批評華而不實之世風。

第五，羅隱著作中，已有《兩同書》兩卷十篇，從哲學角度探討孔子、老

子學說之會同問題，所以純理思辯原本不是《讒書》重要議題，然而在〈天機〉、〈辨害〉等篇，仍有精采的理念辨正。

羅隱在〈天機〉一文，對天道不行，人道差池，作另類闡釋。他將水、旱、殘、賊視為「天道不行」；將詭、譎、權、詐，視為「人道差池」，二者皆為天之「機變」。既然聖人皆不免「隨機而變」，則己之生不逢時，又何足為奇？譏刺時世，反言正出，大發牢騷。本文表面在談哲觀念，其實是羅隱激憤之言。在〈辨害〉一文，論真正的弊害，應先剗除。羅隱利用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為例，說明：此乃「計菽粟」、「顧釣網」者，不能徹底清除國家真正的弊害，其實是在姑息養奸。

（三）舒洩憂憤

懷才不遇，是千古才人共同的不幸。羅隱自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開始求舉，至《讒書》編次時，至少已經七度落第。羅隱在〈重送閩州張員外〉說：「誠知汲善心長在，爭奈干時跡轉窮。」、在〈寄三衢孫員外〉說：「天子未能崇典誥，諸生徒欲戀旌旗」、在〈逼試投所知〉說：「十年此地頻偷眼，

潘慧惠校注，《羅隱集校注》卷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6），頁437。

· 東海中文學報 ·

· 36 ·

二月春風最斷腸。」諸詩中，可謂道盡求舉之艱辛與落第的悲憤，這種悲憤，自然會投射到一些與己相類的對象上。

羅隱在〈敘二狂生〉細論禰衡、阮籍之狂，有其時代因素。並借此抒發不遇之憤悶。羅隱認為：禰衡、阮籍之狂，乃因「漢衰」、「晉弊」，因此無力可挽。羅隱解釋「漢衰」，是「君若客旅，臣若虎豹」；晉弊，是強調名士風度，不重實才。而禰衡、阮籍兩人精神高度太高，不可；任意評論世事，也不可。文中「人難事」，指人心太差，難於共事；「時難事」，說時世太壞，禰衡、阮籍身處如此時世，自難容身於世。在諷刺時世之間，舒洩內心激憤。在〈聖人理亂〉中評比周公與孔子，認為：周孔皆為聖人，而窮達不同、

理亂不同；關鍵在於是否「位」勝其「道」。文中：

位勝其道者，以之尊，以之顯，以之躋康莊，以之致富壽。位不勝其道者，泣焉、歎焉、圍焉、厄焉。

數句，似在為孔子鳴不平，何嘗不是在舒洩羅隱自身「有才不得其位」之憤慨？

又在〈君子之位〉中說：

祿於道，任於位，權也。食於智，爵於用，職也。祿不在道，任不在位，雖聖人不能闡至明。智不得食，用不及爵，雖忠烈不能蹈湯火。」

論職位和權力之必要，並為己有才無位而悲。有道者得祿、有能者得位，此乃權力之真義。因智得食，依用設爵，此即職位之真義。如今卻是有道者無祿、有能者無位，促使羅隱心中的不平，不能不發洩。

再如〈蟋蟀詩〉以範（蜂）、蟬喻達官顯貴，以蚊蠅喻社會敗類，以蟋蟀自我比況。比興手法自我比況，運用之妙令人稱絕。〈梅先生碑〉中，敘述身居下僚之梅福，在朝綱衰頹、外戚專政之際，居然敢上書直諫，使尸位素餐的公卿大臣相形見絀。據史書感，以梅福自況，慨嘆時政。

羅隱在〈答賀蘭友書〉中對友暢敘心曲，表示自己雖有志功名，絕不隨俗伏沈。〈序陸生東遊〉抒發下第的困厄與徬徨，都是直接對知交舒洩憂忿。在〈投知書〉說：「明天子未有不愛才，賢左右未有不汲善者。故漢武因一鷹犬

潘慧惠校注，《羅隱集校注》卷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6），_____頁412。

潘慧惠校注，《羅隱集校注》卷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6），頁431。

· 譎諫與垂訓—羅隱《譎書》探析 ·

· 37 ·

吏而〈子虛〉用，孝元以〈洞簫賦〉使六宮婢子諷之。當時卿大夫，雖死不敢輕吾輩。」但千百年後的狀況，已非如此，此時「居位者以先後禮絕，競進者以毀譽相高」，而自己正落入這樣的「機窖」中。不僅性靈不通轉，進退也多

不合時態。羅隱就古今書生之不同遭遇，鮮明對比。傾吐自己懷才不遇、報國無門之憤悶。

四、《讒書》之諷刺藝術

羅隱一生以「秉筆立言、扶持教化」為己任，自稱「有可以讒者則讒之，亦多言之一派」，「不能學揚子雲寂寞以誑人」，面對晚唐政治、社會種種亂象，懷抱憂患，激切論之；鞭辟入理，切中要害。《讒書》中之作品，無不主題深刻，手法獨到，可謂篇篇精采。具體而言，羅隱最常使用「以史論政」、「寓言諷諭」、「托物為喻」等諷刺手法。

（一）以史論政，鞭辟入理

羅隱熟讀史書，善用史料，寄寓嘲諷之意。《讒書》牽涉之古人，超過五十位；牽涉之史事，以上古最多，舉其要者如：「堯舜禹之治」、「武丁之夢」、「桀紂惡名」、「伊尹立太甲、放太甲」、「夫差殺伍員」、「丹朱、商均非不肖」、「伯成子高讓禹」、「三叔疑周公」、「張良、陳平貌似女子」、「漢武山呼」、「朱買臣妻」、「梅福上書」等都曾出現在《讒書》的篇章中；牽涉之古物有「神羊」、「鳳臺」、「秦鹿」等，都能不落俗套，言人所未言。具體來說，採用了以下的表現手法：

（一）借古諷今：羅隱〈三帝所長〉便是一則「借古諷今」的例證：
堯之時，民樸不可語，故堯舍其子而教之。澤未周而堯落；舜嗣堯理，迹堯以化之。澤既周而南狩。丹與均果位於民間，是化存於外者也。夏後氏得帝位，而百姓已偷。遂教其子，是由內而及外者也。

筆者統計，《讒書》五卷牽涉到的歷史人物有：堯、舜、禹、伯成子高、丹朱、商均、伊尹、武丁、太甲、比幹、商紂、周公（姬旦）、管叔（姬鮮）、蔡叔（姬度）、霍叔（姬處）、尹吉甫、伍員、夫差、太宰嚭、費無極、子產、晏嬰、孔子、莊子、無將、秦穆公、張良、陳平、項羽、劉邦、漢武帝、鄒陽、司馬相如、梁孝王、朱買臣、漢成帝、嚴光、梅福、禰衡、阮籍、隋煬帝等。即以唐朝而言，包括唐玄宗、楊貴妃、唐憲宗、石孝忠、裴度、李愬、李光顏、烏重胤、韓愈、段文昌等前朝人物，數量可觀，超過50位。

· 東海中文學報 ·

· 38 ·

然化於外者，以土階之卑，茅茨之淺，而聲響相接焉；化於內者，有宮室焉、溝洫焉、而威則日嚴矣。是以土階之際，萬民親；宮室之後，萬民畏。

此文論及堯、舜、禹三帝之治，以「公心」自處、以百姓利益為尚。堯、舜傳賢不傳子，「是化存於外」，其居室簡約，聲響相接；而禹卻傳位於其子啓，「是由內而及於外者」，於是帝王開始擁有宮室田產，而且君威日嚴。羅隱顯然是借上古聖君為例，嘲諷當代帝王不知節用愛民。

（二）引史議論：羅隱〈解武丁夢〉，則是一則「引史議論」的例證：
商之道削也，武丁嗣之，且懼祖宗所傳，圯壞於我。祈於人，則無以為質；禱於家，則不知天之曆數。厥有左右，民心不歸，然後念胥靡之可升，且欲致於非常，而出於不測也。乃用假夢徵象，以活商命。

嗚呼！曆數將去也，人心將解也，說復安能維之者哉？武丁以下民之畏天命也，故設權以復之。唯聖能神，何夢之有！

武丁是商朝帝王，殷商王朝自盤庚中興，傳至小乙，其後國事衰微，武丁即位，夢得聖人傳說，畫像而求之，果然得傳說，舉以為相，國大治。本文以特殊角度，說解「武丁假夢徵象以活商命」之意義，認為武丁敬畏天命，設下徵賢的「計謀」，借以恢復商朝的國祚，其實並無所謂「夢徵」。羅隱引武丁之史事，是在慨嘆「曆數將去，人心將解」，整個大唐王朝已無武丁、傳說之聖君賢相。

（三）借史摠感：〈漢武山呼〉政是一則「借史摠感」的例證：

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縱者。苟非其正，則人能壞之，事能壞之，物能壞之。雖貴賤則殊，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諛佞者，人壞之也。窮遊極觀者，事壞之也。發於感寤者，物壞之也。是三者，有一於是，則為國之大蠹。孝武承富庶之後，聽左右之說，窮遊觀之靡，乃東封焉。蓋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民、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於感寤。然後逾遼越海，勞師弊俗，以至於百姓困窮者，東山萬歲之聲也。以一山之聲猶若是，況千口萬舌乎？

潘慧惠校注，《羅隱集校注》卷一，頁394。

同上注，頁397。

· 譎諫與垂訓—羅隱《譎書》探析 ·

· 39 ·

是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為祥，而為英主之不幸。

羅隱在〈漢武山呼〉中提醒帝王，勿為臣下「呼聲」所惑。所謂「山呼」，又稱為「嵩呼」，指臣下祝頌皇帝、高呼萬歲之舉。此文述及漢武帝自恃富強，恣意遊觀、迷信神仙；自祈其身，非祈其民。尤其東封泰山，勞師動眾，吏卒雖高呼萬歲，實不能視為吉祥，而為英主之不幸。羅隱據史書感，諷刺君王「自祈其身、不祈其民」，必將帶來危機。

（四）翻案見意：〈三叔碑〉則是一個「翻案見意」的例證：

肉以視物者，猛獸也；竊人之財者，盜也。一夫奮則獸佚，一犬吠則盜奔。非其力之不任，惡夫機在後也。

當周公攝政時，三叔流謗，故辟之、囚之、黜之，然後以相孺子。洎召公不悅，則引商之卿佐以告之。彼三叔者，固不知公之志矣；而召公豈亦不知乎？苟不知，則三叔可殺，而召公不可殺乎？是周公之心可疑矣。向非三叔，則成王不得為天子，周公不得為聖人。愚美夫三叔之機在前也，故碑。

所謂「三叔」，是武王之三弟管叔（姬鮮）、蔡叔（姬度）、霍叔（姬處）。武王崩，成王尚幼，周公（姬旦）攝政，三叔放出流言，謂周公「將不利孺子」，引起周公征討治罪。羅隱在此解構了周公之歷史形象。本文先在理論上設定「見機」之重要，然後讚美三叔「見機在先」，認為周公是迫於三叔質疑，才放棄篡位野心；從而認為只要是權臣，都應嚴加提防。這樣，在對周公輔佐成王之用心，作了翻案解讀之後，也對晚唐朝之強藩、權臣釋出尖刻的諷刺。

總體而言，羅隱對於史料的運用，不在史實的重現，而是重視史料的解讀；重新掌握歷史問題的本質，諷諭現實。從上述的文例，可以驗證羅隱不論是借古諷今、引史議論、借史攄感、還是運用歷史翻案，都顯現高明的史識，而且諷意十足。

潘慧惠校注，《羅隱集校注》卷四，頁445。

同上注，頁438。

· 東海中文學報 ·

· 40 ·

（二）寓言諷諭，就事議論

羅隱除了「以史論政」技巧甚高，對於寓言之運用，也達到出神入化之境界。出現在《讒書》中的寓言，有作者原創者，也有作者改寫者。都涵藏深刻的寓意與尖銳的譏刺。首先以〈二工人語〉為例，一探羅隱的諷刺藝術：

吳之建報恩寺也，塑一神於門，土工與木工互不相可。木人欲虛其內，窗其外，開通七竅，以應胸藏，俾他日靈聖，用神吾工。

土人以為不可：「神尚潔也，通七竅，應胸藏，必有塵滓之物，點入其中。

不若吾立塊而瞪，不通竅，設無靈，何減於吾？」木人不可，遂偶建焉。

立塊者竟無所聞，通竅者至今為人禍福。

所謂「二工人」指土偶與木偶，是報恩寺的神像。其中木偶開了七竅、土偶則否；木偶與土偶「互不相可」，然而「立塊而瞪」的土偶要比「通七竅」的木偶更為潔淨，因為，通七竅的土偶，比較可能「胸藏塵滓」。但到了最後，土偶默默無聞，而木偶卻被當作神明供奉、至今為人禍福。羅隱顯然不只是在講有關神像的故事，而是借此抨擊社會上重視表面、不重實質之風氣。

再以改寫自《莊子》之〈蒙叟遺志〉為例，再探羅隱寓言的諷刺藝術：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為山嶽，以腸胃為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嶽，滓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焉。

此文題材源自《莊子·應帝王》：「南海之帝儻與北海之帝忽為報中央之帝混沌之德，為鑿七竅」的故事。寫到混沌死後，上帝以其四肢為山嶽，以其腸胃為江河，又慮其「掀然而興」、導致「下無生類」；於是「孕銅鐵於山嶽，滓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卻也使人們困於徭役。這篇不足百字的短文主題是主張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目的在提帝王者，切莫役使百姓，應善體莊子遺意，給予百姓休養生息。

再以改寫自張華《博物志·雜說》之〈槎客喻〉為例，三探羅隱寓言的諷

潘慧惠校注《羅隱集校注》卷四，頁458。

同上注，頁393。

· 譎諫與垂訓—羅隱《讒書》探析 ·

· 41 ·

刺藝術：

乘槎者既出君平之門，有問者曰：「彼河之流，彼天之高，宛宛轉轉，昏昏浩浩。有怪有靈，時顛時倒。而子浮泛其間，能不手足之駭，神魂之掉者乎？」對曰：「是槎也，吾三年熟其往來矣。所慮者吾壽命之不知也，不廢槎之不安而不返人間也。及乘之，波浪激射，雲日氣候，或戶黯然而昏，火霍然而晝。乍塌而傍，乍蕩而驟。或落如坑，或觸如鬥。茫洋乎不知槎之所從者不一也，吾心未嘗為之動。心一動，則手足不能制矣，不在洪流、槁木之為患也。苟人能安其所處而不自亂，吾未見其有顛越，不必槎。」

按：此文字面寫槎客乘槎之訣竅，實則在宣示自己處身亂世之道—「心定則不亂」。張騫乘槎神話故事，原出張華《博物志·雜說》。羅隱用此故事生發議論，意在自勉，作者獨立剛正的節操，表露無餘。

最後以改寫自《述異記》之〈說天雞〉為例，四探羅隱寓言的諷刺藝術。：
狙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洎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狙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觜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儔，見敵之勇。峨冠高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也有是夫。

文中的「天雞」，是一種能力超強的鬥雞，此雞「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然而，養雞人卻未能傳承父親之飼養技術，所飼之雞，虛有其表；既不能司晨，也不善鬥。由上述這些例證，不難窺探羅隱借用寓言諷諭之高明。

總體而言，羅隱之寓言，論其風格，有先秦寓言簡潔深刻、勘落枝葉、直指核心的特色。論其性質與作法，無不關懷政治、針砭現實，類似柳宗元政治寓言的作法，似可視為柳宗元寓言文學之嗣響。

潘慧惠校注《羅隱集校注》卷四，頁444。

同上注，頁418。

· 東海中文學報 ·

· 42 ·

（三）托物為喻，譏嘲世情

羅隱身為儒士，久困科場，卻能深自惕勵，不願夤緣附勢。洪亮吉稱其：

「人品之高、見地之卓，迥非他人所及」。（《北江詩話》卷六），實非虛言。羅隱在〈詠白菊〉中說：「雖被風霜競欲催，皎然顏色不低顏。」（《甲乙集》卷十一）不難看出羅隱以寒士自況，而且高自期許。以這樣的心理，面對畸形的世態，託物為喻，寄寓情懷，也能成爲一種高明的嘲諷手段。例如〈秋蟲賦〉：
秋蟲，蜘蛛也。致身網羅間，實腹亦網羅間。愚感其理有得喪，因以言賦之曰：物之小兮，迎網而斃。物之大兮，兼網而逝。網也者，繩其小而不繩其大。吾不知爾身之危兮，腹之餒兮。吁！

羅隱以秋蟲，喻帝王；物之小者，比喻人民；物之大者，比喻宦官、藩鎮。晚

唐帝王只能壓制平民百姓，而對於宦官、藩鎮則束手無策，反而深深受其掣肘。因此文中所謂：「繩其小而不繩其大」，正是針對帝王而發。明顯採用「託物喻意」手法，寄託諷刺之意。再如〈屏賦〉

惟屏者何？俾蕃侯家，作道堙阨，為庭齒牙。爾質既然，爾功奚取？迫若蒙蔽，屹非裨補。主也勿覲，賓也如仇。賓主牆面，職爾之由。吳任太宰，國始無人。楚委斬尚，斥逐忠臣。何反道而背德，與枉理而全身。

爾之所憑，亦孔之醜。列我們閭，生我妍不？既內外俱喪，須是非相糺。屏尚如此，人兮何知！在其門兮惡直道，處其位兮無所施。阮何情而泣路？墨何事而悲絲？麟兮何歎？鳳兮何為？吾所以淒惋者在斯。

文中之屏，是「當門小牆」，而非日常之屏風。羅隱以屏為喻，意在揭露臣下之遮蔽視聽。權臣用事，障蔽君聽，恰如屏之「作道堙阨，為庭齒牙」、「迫若蒙蔽，屹非裨補」，其弊害不可小覷。羅隱使用賦體鋪陳之文筆，意在嘲諷當時障蔽君王之權奸。再如〈雜說〉說：

珪璧之與瓦礫，其為等差，不俟言而知之矣。然珪璧者，雖絲粟玷類，人必見之，以其為有用之累也，為瓦礫者，雖阜積罄盈，人不疵其質者，知其不

潘慧惠校注《羅隱集校注》卷一，頁396。

同上注，頁423。

· 譎諫與垂訓—羅隱《譎書》探析 ·

· 43 ·

能傷無用之性也。是以有用者絲粟之過，得以為迹。無用者具體之惡，不以為非。

亦猶鏡之於水，水之於物也。泓然而可以照，鏡之於物亦照也。二者以無情於外，故委照者不疑其醜好焉。不知水之性也柔而婉，鏡之性也剛而健。柔而婉者有時而動，故委照者或搖蕩可移。剛而健者非闕裂不能易其明，故委照者亦得保其質。

此文前段以珪璧、瓦礫為喻，謂珪璧之玷類，人必注意，以其有用；瓦礫雖多，人不疵其質，以其無用。託物為喻，諷刺「有用者絲粟之過，得以為跡。無用者具體之惡，不以為非。」之世風。後段再以鏡、水為喻，謂已絕不改變本性

以求合世俗。再如〈道不在人〉：

道所以達天下，亦所以窮天下，雖昆蟲草木，皆被之矣。故天知道不能自作，然後授之以時。時也者，機也。在天為四氣，在地為五行，在人為寵辱、憂懼、通阨之數。故窮不可以去道，文王拘也，王於周。道不可以無時，仲尼毀也，垂其教。彼聖人者，豈違道而戾物乎？在乎時與不時耳。

是以道為人困，而時奪天功。衛鶴得而乘軒，魯麟失而傷足。

以衛國懿公好鶴，得以乘軒車；魯國獲麟，傷其一足。遭遇何其不同！作者認

爲：能否得時，是其關鍵。羅隱認爲：「道爲人困」、「時奪天功」得「時」與否，決定窮達。借物爲喻，以舒懷抱，兼慨自身遭遇。

總體而言，羅隱託物之作，構思精巧，文筆跳脫；喻托之物，無非尋常，卻能蘊含深刻、諷諭銳利。羅隱雖志在求舉，卻始終與晚唐政治社會維持距離，以其所見之真，故能下筆如神。

（五）羅隱《讒書》之評價

羅隱以其《讒書》譏議時政，臧否世風，舒洩不遇之幽憤，一方面獲得時流的稱賞，一方面也爲其遭遇而慨嘆。晚唐詩人徐夤〈寄兩浙羅書記〉說得好：「博簿集成時輩罵，《讒書》編就薄徒憎。」（《全唐詩》卷709）羅袞〈贈羅隱〉也說道：「平日時風好涕流，《讒書》雖盛一名休。寰區歎屈瞻問天，夷潘慧惠校注《羅隱集校注》卷二，頁415。

同上注，頁429。

· 東海中文學報 ·

· 44 ·

貂聞詩過海求。」（《全唐詩》卷734），所述應是實情。

唐·齊己〈寄錢塘劉給事〉：「憤憤嘔《讒書》，無人誦〈子虛〉。傷心天祐末，搔首懿宗初。」（《全唐詩》卷838）提到羅隱對晚唐政局的關懷，持續幾五十年。從懿宗咸通到哀帝天祐（羅隱二十八歲到七十四歲），親眼見證唐朝如何由衰敗到滅亡，《讒書》雖是羅隱前半生的力作，陳述的內容卻似乎預示了後半生所處的外部環境。而這正是《讒書》的價值所在！

歸仁在〈悼羅隱〉說：「一著《讒書》未快心，幾抽胸臆縱狂吟。」（《全唐詩》卷825）兩句兼論其文章與詩篇，如果吾人能回到晚唐的「語境」，不難體悟羅隱那種「未快心」與「縱狂吟」的悲憤心境。吾人應知《讒書》公諸於世之時，功名未立、而國事蝸蟻，處在這樣的情境，寫這種快意諷刺之作，要付出多大的代價、需要多大的勇氣啊？！

筆者十分認同元·黃貞輔《羅昭諫讒書題辭》所說：「唐末僭爲紛起，立其朝者，安食厚祿，充然無赧容。如公沈淪下僚、氣節弗渝者幾何人！……在昔，慳邪輩豈無絺章績句、取媚一時，而泯泯莫聞。公氣節可敬可慕，凡片言只字，皆足以傳世，況其著書垂訓者乎？」道光三年《新城縣志》卷二十三載錄清洪應濤〈書羅隱傳後〉也說：「嗚呼！國家存亡之際，最足觀君子之用心矣。昭諫公於唐末造，窮於所遇，今讀其〈請追癸巳日詔〉，謂陛下憂、岳瀆亦憂矣，直通乎天人之際也。」羅隱在《讒書》五卷中所陳述的將不只是晚唐的政情，更可貴的是真實呈現「青年羅隱」可敬可慕的氣節，僅憑這一點，已經可以使《讒書》傳世不朽。

魯迅在〈小品文的危機〉中曾經指出：「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爲隱士，別人也稱之爲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

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塌糊塗的泥塘裡的光彩和鋒鋦。」魯迅將羅隱的《讒書》定位為「抗爭和憤激之談」固然不錯，然而羅隱似乎還懷有儒家「借史垂訓」之意向，只因羅隱不僅「委婉譎諫」，更使用了「批判諷刺」的手段，使人很容易忽略這一點。

轉引自潘慧惠校注《羅隱集校注》附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6），頁653。

同上注，頁688。

· 譎諫與垂訓—羅隱《讒書》探析 ·

· 45 ·

六、結語

羅隱以《讒書》這一本青年時期的自選集作為行卷工具，結果卻超越了唐代青年舉子求仕的正常功能，反而成為批判晚唐政治社會的作品。

羅隱雖然使用了多種多樣的諷刺手段，但《讒書》的內容絕不單是「激憤與抗爭之言」，從這五十八篇作品來看，延續儒家「委婉譎諫」的傳統，寄望對時政有所裨補。從《讒書》大量運用歷史素材，不難覺察：羅隱在面對時政、反映社會問題時，仍有儒家知識份子「借史垂訓」的意圖。

羅隱遙承白居易「為君、為民、為時而作，不為文而作」的寫實精神，以《讒書》回應晚唐政治與社會種種亂象，是基於學術良知，不能不言；因此《讒書》五卷，充分代表「青年羅隱」對晚唐政治情態與社會現實的「嚴正關懷」。羅隱在《讒書》中使用高明的寫作技巧，提升諷刺的力道；全書包括近二十種文體，堪稱中國古典文體的集中操練與展示。其寓言作品數量雖然不多，卻短小精悍、創意十足，獲得極高的文學成就。凡此，都使《讒書》一書，成為唐代諷刺文學不可多得的傑作。

參考書目

1. 華文雍校輯《羅隱集》（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3.12）
2. 潘慧惠校注《羅隱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6）
3. 田啓文《晚唐諷刺小品俗之風貌》（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3）
4. 潘慧惠〈論羅隱及其詩文〉（《文史哲》，1995年第1期）
5. 李定廣〈遭歷史誤會的文學巨人—羅隱文學史地位之重估〉（《學術界》雙月刊，總第121期，2006.6）
6. 惠聯芳〈晚唐怪傑—羅隱〉（《南寧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22卷第1期2005年3月）
7. 翁敏〈羅隱《讒書》藝術論〉（《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4年2期）翁敏程顯平〈讀羅隱《讒書》劄記〉（《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2期（第30卷第2期））
8. 吳器〈《讒書》—匡政濟世、發憤抒情之作〉（《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東海中文學報·

· 46 ·

學版，第6 卷第4 期2004 年11 月)

9. 劉暢〈簡論《讒書》中的故事新編〉(《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 卷第4 期，2004 年11 月)

10. (2010 年10 月16 至19 日出席天津南開大學文學院主辦「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五屆年會暨唐代文學國際研討會」，並在會上宣讀)

· 譎諫與垂訓—羅隱《讒書》探析 ·

· 47 ·

Admonishment by Hints and Transmitting Lessons –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Luo Yin's *Chan Shu*

Lee, Chien-kun*

【 Abstract 】

The litterateur, Luo-Yin (833-909),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was gifted in both literature and poetry, especially his *Chan Shu* including 5 volumes attracted people of the coming generations. At the beginning, *Chan Shu* was only an instrument to send someone's writings to prominent officials and eminent personages, finally it transcended its function of seeking-government-position and became a work to criticize the political and the society. These 58 essays were still keeping on Confucian school's tradition "ingratiating admonishment" and were with intention of transmitting lessons with history. Luo Yin succeeded far away to Bai Chu-Yi's realistic spirit that witting was for monarch, people, and the Age rather than literature, and utilized *Chan Shu* for reflect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fusion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which represented that young Luo Yin concerned seriously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social reality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The book was written by a clearer ingenuity to raise the strength of satire; meanwhile it included near 20 styles of writings that could be an exercise and display of classical style of writing. Although it was a small number of works of fable, its originality was great. Accordingly, *Chan Shu* was a rare work of satire in Tang Dynasty.

Key words: Luo Yin *Chan Shu* Luo Chao Lien Chi Liang Tong Shu
Volume A and B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__